



2020年5月31日
星期日
中共衡阳市委机关报



今日四版 农历庚子年闰四月初九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4 第 17487 号
衡阳日报社出版

CULTURE WEEKLY

衡阳史话之经贸篇①

民国时期衡阳现代工业起步(上)

民国时期的衡阳是中国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城市之一,现代化工业由过去相对落后而变得兴旺起来。各个行业相继出现现代化工厂或手工工场,小企业林立于街头市井之中。除了常宁水口山铅锌采矿与冶炼外,还有煤矿采掘、军火生产、铁路运输等。这些企业正在使用或者已经使用机械化或半机械化进行生产,以蒸汽或电力作为生产的动力。手工业则有纺织、酿酒、铁器、陶瓷、造纸、造船、五金、皮革、印刷、角梳、民船运输、建筑、码头、人力等等。单是民国初年,仅衡阳城区从事各类手工业的有 40000 人左右,各县区手工业工人和产业工人有近 60000 人。这些厂矿与企业对衡阳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改变了衡阳长期相对落后的局面;二是改善了生活,发展了生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三是为现代衡阳经济建设提供了物质、经济、文化与思想的基础。四是开始改变长期以来的单一农业经济体系,形成了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多种生产体制,为衡阳现代化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缓慢发展的农业

随着社会的前进,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衡阳农业生产持续向前发展。这种发展总体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粮食产量缓慢发展,衡阳境内粮食总产量最高将近 10 亿公斤,约合 2000 万石,是乾隆时期的两倍。

第二,双季稻生产正在起步。双季稻的起步是一个历史的巨大进步,是农业生产技术的一项重大革新,也是水稻生产的一项飞跃。据萧远猷 1937 年《衡阳稻作概况》记载:“滨湖、蒸、耒三水种稻,约早、中稻各半。晚稻栽种面积极少,均散布于各乡山谷低沼之冲田。”1938 年,衡阳地区列入湖南省双季稻推广区。这一年种植了双季稻 29.887 万亩,占水稻总面积 7.5%。到 1947 年,境内双季稻产量达 3499.64 万公斤。按当时生产水平折算,双季稻面积大致在 35 万亩以上。

第三,专业经济作物区域开始形成。如果说明清以来单一性粮食生产的格局开始打破,农业作物除水稻外,还有了棉花、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生产,形成了专业经济生产区域及地方名产、特产。第四,红薯生产成为衡阳人民除水稻外的另一项最重要的生产项目。据《中国实业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调查资料显示,境内红薯生产规模相当可观。当时的耒阳、衡山、常宁、祁阳(含祁东)4 县共种红薯 50.72 万亩。其中,最多的为常宁,种植 21.6 万亩。后由于战争,红薯生产急剧下降,种植面积锐减。1949 年,全境下降到 2.38 万亩。

第五,围绕以解决吃饭问题为主的各种粮食作物普遍种植。人们种植红薯之后的旱地,在收获之后,还可以种植小麦、大麦、燕麦,其中以小麦为主。民国时期,境内玉米生产不稳定,单产低。据湖南农业系统农业民进所 1948 年农情报告估计,境内衡山(含今衡东县),衡阳(含今衡南),祁阳(含今祁东县),常年总产量共 41 万公斤,当年为 30 万公斤。由于多为山区农民所种,耕作十分粗放,因而产量不高。

第六,家庭饲养业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传统生产方式是家畜饲养业与农业、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农村普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养牛是为了耕地,养猪是为了吃肉,积肥。家庭饲养业就是这样与农业紧密结合起来的。人们用吃剩余的饭菜,发黄的菜叶,洗碗筷与淘米的剩水,加上碎米烂糠……田头地间一把野草,都可以用来喂猪。养猪不仅让贫困人家用来贴补家用,逢年过节还可以吃到肉,猪油为全家一年食用油的主要来源,卖肉又可以供子弟衣食住行之用。全境每年产猪 60 万头左右,但销往外地的占总数的 70%以上。

百货行帮齐集衡阳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加上自然灾害,农民们几乎无法安心进行生产;军阀们派粮派饷,农民不堪重负。由于商品市场的形成,工厂的涌现,城市挣钱比农村容易,许多无地少地逃往外乡的农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出卖劳动力,或成为厂矿廉价的工人,或为船夫、短工挑夫、小菜贩、佣人等。

民国时期的衡阳商业进入一个崭新的繁荣发展阶段。首先是行业众多。据《中国实业志》记载,共有行业 75 个,主要有:绸布、百货、南货、土果、油盐、酱油、烟丝、土布、筵席、茶楼、旅馆、碎货、陶瓷、棉花、铁器、煤栈、煤油、鱼行、纸扎、笔墨、草席、蜡烛、药店等。其次是店铺多,总计抗日战争前的衡阳城区内有各种各样的店铺近 200 个。第三是从业人数多,从业人员 6154 人。在衡阳从事商业的除衡阳人外,外地商人有江西、广东、湖北、广西等省人。其中以江西人最多,实力也最为雄厚,人称赣商。赣商按照地域不同占据不同行业,南昌人占据油脂业,丰城人独占金银首饰业的鳌头;而清江人则拥有中药业,吉安人比较复杂,钱庄、纱布、染坊、南货、油酱,只要有钱可赚,什么行业他都插手;至于典当、盐仓、旅店、筵席、影剧、浴室,到处都是赣商的字号。

这么多赣商进入衡阳,对衡阳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店铺,不仅遍布城区各个角落,而且他们都以信誉作保证,取信于民,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种商业交易的诚信化促使衡阳商人不断制作出精巧的商品,不仅科技含金量高,也成就了一些名牌、名产。

江西吉安商人胡品高,资产超过百万银元,他在衡阳道后街有信孚当铺、马嘶巷有盐仓,南正街有衡阳最大的惠孚南货店,专营各种海味、南货、糕饼、油酱的批发。他还倡导在衡阳建立江西会馆——庐陵会馆,整个工程耗银 24 万两,他一人捐银 13 万两。

衡阳本地商人以李向荣为首。他所经营的绸布业拥有资金近 50 万元。李氏讲究信誉,信守合同,开始做油盐生意,从不短斤少两,甚至还加一出头,数年之间,就成为衡阳首屈一指的油盐商。向银行借贷款,从不拖欠,即使不能按期还贷,不惜高利借贷也得如期偿还。他还利用信息,大胆经营。如 1924 年衡阳发生历史上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民国期间的老茶馆 据知网



上世纪的衡阳现代工业产品 黄沐摄于衡阳工业博物馆



衡阳火车站与粤汉铁路 黄沐摄于衡阳工业博物馆

河街(今沿江路)被淹,他将损失的洋油从洋人那里获得部分赔偿,减少损失 10 万元。又如经营房地产,利用衡阳将建火车站之际,在湘江东岸预购地皮新建大片房屋出租。1925 年拆除衡阳城墙时,他不失时机地将城墙外大片地皮买进出租等。资金雄厚起来后,他经营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不仅油盐行,也涉及卷烟、丝绸、百货、颜料、钱庄、房地产等行业。仅 1925 年前后就新增八大店铺(公司),有 100 多栋铺房出租,家有良田 3000 多亩,每年仅收取租谷就达 3700 多石。

衡阳至今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地名——向荣里。李向荣是衡阳本土最有经济实力的工商业者兼地主。他在各县商业店铺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1934 年仅在衡南县就有商店 1508 家,年营业额达 1500 万元左右。乡村各墟场有商店 1823 家,经营 20 多个项目。还有小摊贩 3100 多户,行商 130 多户。

民国时期,衡阳的公路、铁路通车后,沿道路形成了大量的集镇,这些大小集镇成为农村最广阔集市贸易场所。如衡南的三塘、谭子山、泉湖、鸡笼街、茶山坳;衡阳的呆鹰岭、西渡、台源、洪罗庙;衡山(当时衡东还未析出)的大浦、霞流、石湾与洩河;常宁的松柏、柏坊;祁东的洪桥、白地市、风石堰;耒阳的灶市、哲桥、小水、公平、东湖等。

衡阳县历史上曾经成立过的行帮、会帮,遍布各行各业,如绸布店有“慎锦会”,旅社则是“宾兴会”,船工有“杨林会”,煤矿工人有“上山王会”……各会都有自己的章程。最著名的是江西人在城南新街组成的江西会馆,吉安人的庐陵会馆,他们的主要职责一是确定同行内部商品的统一销售价格,达到保护自己利益的作用;其次在商务方面与衡阳地方或官方发生纠纷与矛盾时,由商会出面进行交涉,保护江西商人利益,解决江西商人内部矛盾纠纷;三是解决江西人在衡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同时,为了发展江西商人的生意,他们还做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修桥铺路的工作。如吉安商人胡品高独资修筑从衡阳到吉安的石板大道,每到分岔路口,都另立指示石碑,并且在这条道路通过的江河上都设有义渡,对来往于此的江西客人食宿收费低廉等等。

清朝末年,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清政府设立商部,各地成立商会,衡阳商会成立于 1909 年,第一批加入商会的工商户就达 700 多户。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国民政府颁布《临时约法》《保护人民财产令》和《商会法》,法令规定人民的财产,非经正式裁判宣告,不得擅自充公或查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以法律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商人可以选举自己的会长,有了由工商户自己选举而不是由某人指令的选举权力。

从商部、商会到《临时约法》《保护人民财产令》《商会法》,国家从政治体制、最高立法层次上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保护,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商部的成立标志着工商业是国家的重要行业,商人与别的行业人员一样是具有同等地位的国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垮台,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基本保证。

民国政府颁布保护私有财产的法令,只不过是一张纸上文书,商人要真正成为拥有自己权力的公民,那还为时过早。封建专制主义、强权政治等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军阀们心中根深蒂固。

1918 年吴佩孚进驻衡阳,公然要商会捐款 3 万元用于战争,遭到商会董事会的拒绝后,他立马将大商户主捉拿,敬一堂店主副会长杨某不得不出面与之周旋,付出 2700 元才得以救回人质。吴佩孚在衡阳征收田赋共计白银 16 万多两作为自己所有,又“借”商行 4 万元。

五四运动的进步思潮深入衡阳,人们纷纷抵制洋货,衡阳商会同样地以爱国主义的热情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他们自动地成立了提倡买卖国货的“国货维持会”,不许贩运贩卖洋货,并对已有的洋货进行处理,使洋货一时在衡阳没有市场,大大提高了民族工业产品在衡阳的销量,也增长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至 1934 年,衡阳共有工商业户 2177,从业人员达 17000 余人,涉及 91 个行业。

采矿掘煤工业兴盛发展

民国时期的衡阳矿冶业与采煤矿业是湖南省最早采用机械化生产的行业,衡阳也是湖南省最早走向近代化的城市之一。常宁水口山、祁阳(今祁东)清水塘、衡山银矿冲(今衡东县境内)铅锌矿在管理、设备、采矿、冶炼、运输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由于近代工业起步较早,其产业工人居全省之首,以铅锌与煤炭为龙头带动了衡阳的其他产业如机械业与电力、铁路与公路、军工与民工的进步与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管理的矿砂生产逐渐走向正轨,民采民炼的滥挖滥采现象得到控制,机械化采矿代替手工挖掘。1917 年,水口山铅锌矿进口西方设备,进行大规模的厂矿改造,安装了各类机械,所选矿砂产量居当时全国首位,质量同样也是第一。

矿山开采除政府控制外,私人集资办公司和企业也风起云涌。1915 年,长沙人黄金田组成顺成公司,在常宁采矿,他采用排水动力系统,进行半机械化,开采锡、铜等矿;在桂阳、耒阳一带,也有许多私人集资办矿。1914 年,衡山铅矿公司成立。1938 年,邵阳刘金华在祁阳清水塘设立民生公司。1942 年,新化人潘家济也在清水塘设立公司,并收买民生公司矿区;总计各式各样的矿工人数达 3000 多人。

1916 年,水口山每年所产铅锌达 37788 吨,职工人数达到 3000 多人,多为半机械化到机械化生产。随着生产设备的日益更新,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量年年上升,平均每年增产达 10%以上。

后来战争促使了军事工业的兴起,也带动了民营生产的发展。衡阳军火工厂的出现既是军阀混战的结果,也是近代工业兴起的必然。民国的军阀混战需要武器,而衡阳正处于南通广东沿海、西控黔桂的重要战备枢纽之上,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加上这里矿藏丰富,工人数众多,技术工多,因而成为各地军阀投资设厂的首选地址。

1917 年,湖南省政府拨款 70 万元,在东阳渡设立军械局;1920 年,唐生智又拨巨款从美国购进制造子弹机器 83 台、拉枪管机 3 台,车床、铣床、刨床及发电机、锅炉蒸汽机,建成 9 座生产车间,能够生产机关枪、步枪,还可修理大炮,是当时湖南最大的现代化军工机械企业,有工人 1800 余人。

除采矿、军工企业外,衡阳境内的煤炭资源也十分丰富。当时的煤主要集中在耒阳、常宁,仅耒阳境内探明煤炭储量 4.3 亿多吨。民国年间,最早采用机械化开采煤矿的是西方人,与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开采有着一定的联系。当时,由于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产量日增,工人数大增,各种其他设施也相应有所增加。深井需要通风与抽水,需要蒸汽动力的排水排风设备,这些对于煤炭的需求量大增。除公办煤企外,私人采煤就更多了。1932—1943 年,耒阳年均产煤约 15 万吨,常宁年产也在 10 万吨以上。煤炭除了做燃料外,还可以用来发电。1915 年,衡阳区建立泰记电灯公司。这是一家专供居民家庭用电的发电厂,它第一次使衡阳平民百姓用上了电灯,尽管当时许多深受迷信思想影响,人们将电灯视为鬼火,不敢用电,但电灯照亮了衡阳街头,并从此走进了千家万户。

1939 年日寇进攻长沙,湖南省政府迁往耒阳,为供省府机关和照明用电,省建设厅于 1941 年在耒阳县城投资开办电厂,设两个发电所,配 45 马力和 15 马力木炭引擎原动机各 1 台,20 千瓦和 12.5 千瓦发电机各一台,实际发电能力 25 千瓦,平均日发电量 117 千瓦。1943 年,改配 40 马力和 15 马力蒸汽机各 1 台,发电容量共 41.5 千瓦。

1935 年出现私营火电,私商陈炳文在县城创办振兴电灯公司,以煤气引擎做原动力,配 4.5 千瓦发电机发电。1946 年 10 月,李振湘等兴办光明电厂,装机容量 12.5 千瓦,年发电量 9200 千瓦,后更名为耒阳大光明电厂,至 1949 年 9 月止,年电量 1.27 万千瓦。其后,粤汉铁路车辆修理厂和从私营转协的湖南省建设厅衡阳电厂相继建立起来。

民国初年,全省各类工人仅 2.5 万人,真正的产业工人并不多,而衡阳的产业工人总数就达 6600 余人,这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工人阶级队伍。衡阳的现代化工业起步之早也是湖南省少有的。采矿、军工煤采掘,为湖南第一。

(本报记者胡建军根据《衡阳历史文化丛书经贸史述》编辑整理)